

数字时代,网络不再像传统媒介那样以内容为核心而是结成了一个以用户生成内容和人际关系为核心的虚拟社区这一全新的传媒环境让那些一直处于小众和尴尬境地的亚文化有了展现自我的新舞台

一种文化研究的新视角



A New Angle of Cultural Study

朱丽丽等 著

数字青年

一种文化研究的新视角

2011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
“网络迷群体文化研究”成果
项目编号: 11YJC860064

The Digital Youth

A New Angle of Cultural Study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数字青年：一种文化研究的新视角 / 朱丽丽等著. —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10

ISBN 978-7-214-21420-1

I. ①数… II. ①朱… III. ①青年—生活状况—研究—中国 IV. ①D432.7-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54773 号

书 名 数字青年：一种文化研究的新视角

著 者	朱丽丽等
责 任 编 辑	周晓阳
装 帧 设 计	soleilvant@163.com
出 版 发 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52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19.7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214-21420-1
定 价	39.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审批号:苏费核(2017)JF-0991 举报电话:12358

绪论：数字青年的日常生活与文化实践

数字转型是 21 世纪最深刻、最基本的变化。社交网络作为数字社会的重要表征，对青年群体文化的形塑作用不可小觑。在中国，微博、微信、QQ、人人等社交网站已经成为作为“数字原住民”的青年群体的主导型生活形态。对当下青年群体的文化研究绕过社交网络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在网络使用方面。社交网络作为一种“新技术”和“新经济”日益渗透到普通人尤其是青年群体的日常生活中。在此种背景下，考察并研究社交网站与青年群体的生活方式、文化消费之间的关系，具备较强的当下性和研究价值，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知青年群体的日常社会—文化实践。

一、青年文化研究的跨学科导向

探究数字社会的青年文化的问题，首先需要思考研究范式的问题。本质上有关媒介文化的研究，西方学术思想可以分为两大阵营：一个是源于欧洲的批判学派，一个是美国的实用主义学派。在欧洲，最经典的媒介文化研究是延续英国文化研究的范式，对边缘亚文化群体和青年文化进行深描。当代青年文化研究的主流无疑是文化研究学派，经典理论

从霍尔(Stuart Hall, 1973, 1981)的“编码解码”理论伊始,《反抗如仪》(*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 1976)的出版将亚文化概念引入文化研究,它将原本不被重视的青少年另类文化现象如流行音乐、风格、时尚等置于媒介与文化关系的视域之下。尤其在探讨社会生活方式的一些次(sub)单元或差异文化空间(spaces of deviant cultures)层面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影响了其后青年文化研究的主流。在文化研究之外,青年文化研究有政治经济学范式,如研究流行文化与统治意识形态的关系(Murdock & Golding, 1977);结构主义—符号学范式,除了文化研究学派早期泰斗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之外,布朗迈特(Brummett, 2006)的《流行文化的修辞学》是代表性作品;法兰克福学派和后现代主义也是重要的理论来源。从一开始,占据主流地位的文化研究学派的研究就脱离不了“媒介”和“青年文化”两大主题。

按照冯应谦(2007)的总结,媒介与当代青年文化或曰流行文化研究的核心议题有如下几种路径:前两类以文化生产(cultural production)为核心。其一、集中分析流行文化生产工业的性质,如瓦斯柯(Janet Wasko, 2002)对跨国公司文化、政治和经济影响的研究,格瑞沃(Grewal, 1999)对美泰(Mattel)玩具商芭比(Barbie)的跨国性及其霸权的研究。马杰伟对时尚工厂的研究(2012);其二、集中处理流行文化的政治经济推广过程,如冯应谦(Fung, 2004)分析歌手刘德华的形象塑造;其三,注重流行文化文本内的意识形态;其四和其五是以受众和流行文化消费者为中心,前者比较注重文化消费过程的习惯与行为,如詹金斯(Jenkins, 1991)的粉丝文化研究;后者重点在于文化消费学挪用流行文化的目标和表现,不同的弱势群体如何通过文化展演维系社群身份认同,抵抗社会规训。西方比较权威的研究有赫布迪齐(Dick Hebdige)的《次文化》(*Subculture*)。

在美国学术界,关于网络与青年亚文化的研究大致有三种取向:技术决定论、社会建构论、技术—社会相互建构论(Mesch, 2009)。新媒体

到底如何影响青年群体的态度、价值以及行为？不同的研究取向对此有不同的回答，而这并非新近才出现的争议。技术决定论有一预设前提，即技术是推动社会变革的独立力量。它预设网络作为一种媒介技术决定了使用者，尤其是青少年的行为与文化。在这一取向影响之下，青年人往往被贴上“网络一代”、“数字居民”等等的标签，其暗含的假设即网络技术作为一种“时代”力量，有塑造甚至是决定青年人态度及行为的力量。不难发现，这里的青年人是同质化的青年——它预设了有相似媒介使用的青年是同一类青年人，他们将有相似的态度、价值观与行为。这一类研究在美国仍是主流。它以定量研究为主，其目标是探讨“网络使用”与各种“青年亚文化”之间的因果关系，以解释、预测和/或控制青年文化。这类研究往往把青年，尤其是青少年，视作社会“问题”，研究的目的是诊断确认与青（少）年相关的、因网络使用而导致的各类问题。其中，以网络与青（少）年身心健康为主题的研究较多。如评估青少年网络使用与暴露于网络色情的“危险”系数（如 Wolak, Mitchell, & Finkelhor, 2007）；研究网络对青年使用烟草的影响（见 Forsyth, S. et al, 2013）；在《作为青少年暴力向量的网络媒体》（Patton et al, 2014）中，研究者指出，包括霸凌、团伙暴力以及自我导向暴力在内的各种青年暴力行为在网络世界里均出现上升，而该研究则旨在建立有效的预防与介入措施。

社会建构论则相信青年人并非同质的群体；其媒介资源、媒介技术以及意义建构过程都不尽相同。Pauline Cheong(2008)的研究就指出，即使在新加坡这样一个网络使用如此普遍的国家，青少年的网络技术仍存在巨大差异，并非铁板一块。技术社会建构论还认为，媒介本身并非独立的力量，而是社会建构的产物。这一路径强调权力关系与社会结构，即新媒介能构成建构新的青年文化（但同时也能固化现存社会关系）。这一研究取向往往强调青年人使用网络的能动性。如在《数字品味：社会阶级与青年人的技术使用》中，研究者发现，网络技术被推崇或

是排斥,取决于它是否与青少年现存的思维方式相协调,而后者往往为社会阶层所决定;数字鸿沟不仅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是文化问题。

最后,技术—社会相互建构论试图超越“技术决定社会”还是“社会决定技术”这样的二元对立。它支持数字空间乃独特的文化空间这一论断,同时又将之嵌入于日常生活的脉络之中,旨在揭示网络文化与更大的社会语境之间相互形塑、相互建构的关系。换言之,它将技术与社会之间单向的“是……还是……”的争论变成了“既是……又是……”的双向辩证关系。这一取向的研究很多着眼于青年人如何使用网络以融入更大的社会群体。Livingstone (2003)的研究就系统回顾了儿童与青少年各种网络使用与身份认同之间的复杂关系;在 Elias & Lemish (2009)的研究中,研究者则展示了新移民青少年的网络使用,强调了网络在弱势群体中的角色,即网络有着窄化知识与社会鸿沟的潜力。

我们研究数字社会的青年文化,与任何其他研究一样,始终需要根据研究问题,在不同的研究范式之间穿越调整。而对经典研究的路径梳理可以促使我们更全面地鸟瞰这个研究领域的图景,这是开展自己的研究的必备基础。对于一个充满层出不穷的新现象的研究领域,不同的研究边界是不断重叠和相互影响的。而这些理论范式的回看与比对,都可以帮助我们在研究中始终保持与前人研究对话的意识及动力。

二、在“跨国理论”与“本土现实”之间

从中国大陆学术界的情况看,近年来,国内学者对青年亚文化的探讨,开始逐渐建立在网络新媒体视角上。到了今天,关于青年亚文化的主流研究,已经很难与新媒体文化完全划清界限。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及借此形成的各种媒介平台,诸如网络社区、即时通信、社会化媒体等成为研究青年亚文化的重要切入视角,由此也反映出青年亚文化与新媒介之间那种天生的异型同构的特点(马中红,2012)。国内八九十年代的亚文化研究,集中于代沟、摇滚乐、“越轨”行为、校园亚文化等方面,在

对具体的青年亚文化现象的原因分析中，普遍遵循着“青年受挫——产生隔阂与对抗——形成亚文化表达”的逻辑。而在这一逻辑链中，并未强调大众媒介与传播这一环。这一时期的青年亚文化研究中，以社会学视角与方法作为绝对主导，而对关乎青年亚文化的政治、语言、媒介传播现象，虽然有所涉及，但未能形成集中、持续的研究(陈霖，2011)。

新媒体不但催生了当代青年亚文化的蓬勃发展，更进一步地成为亚文化的再现与表征镜像。在网络青年亚文化范畴，典型的研究课题包括孙黎(2012)的字幕组文化；牡丹(2014)的网络文字涂鸦；马缘园(2014)的弹幕分享与评论方式；陈霖(2010)、曾一果(2009)、刘宁(2014)、盖琪(2013)等学者的微视频和新媒体数字短片研究；蒋建国的网络小清新文化(2014)；马中红(2012)等关于“同人女”的研究等等。同人文化、御宅族文化、视频分享文化、网络游戏文化、网络语言文化、网络文学文化、耽美文化、粉丝文化等是网络青年亚文化研究的主要对象。正如有研究者考察了青年“御宅族”媒介使用后所指出的，新媒介的广泛应用为亚文化的壮大提供了机会，而亚文化的壮大反过来又为媒介技术的发展创造新的需求。总体来说，主流青年文化研究的理论话语局限于英国伯明翰学派的青年亚文化理论。但随着社会变迁，发生了新的转向，即后亚文化研究由“抵抗”向“生活方式”的转变。新一代亚文化研究者对伯明翰学派的“阶级”、“抵抗”、“风格”等核心理论观点进行质疑，提出了“生活方式”、“新族群”、“场景”等后亚文化研究理论关键词，旨在考察变化了的青年亚文化现象，鲜明的媒体意识则是后亚文化的典型特征。具体的分析案例包括蒋建国(2014)对网络“小清新”文化和蔡琪(2015)对“果粉”文化的考察等。

而在另一派注重传播效果与动机多于文化文本的研究者那里，有关青年群体在日常生活中的诸多社交媒体使用行为，使得后续的社交媒体研究的取径转而更为肯定主体能动性，并试图深入理解社交网络在其日常生活实践中的结构性地位和使用经验的本质。目前有三

种主要研究取径,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取径,则多从动机论的角度,从个体的、心理的面向来解释社交媒体的使用行为;社会资本的取径,则往往是从个人理性选择论的角度,来论述社交媒体对个人社会资本与利益的提升的影响;新素养的研究取径,主要从素养的应然面向或能力面向来论述青少年社交媒体行为。国内对社交媒介相关研究不少,基本集中在如下层面:1. 探讨社交网络在社会化进程中的作用及文化建构。如熊澄宇等(2012)讨论了社交网络的社会属性,陈昌凤等(2012)讨论了媒介的平台化与社会化,杨新敏(2010)讨论了社交网络与中国圈子文化之间的叠加关系。2. 基于“技术接受模型”和“使用与满足”理论进行实证性量化研究。王娟(2010)、黄浩铭(2012)分别研究了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因素和社会性动机、情感性动机、记录表达动机以及信息性动机对于用户使用行为的影响。3. 关注社交网络对于青年社会资本方面的影响,如郑宇钧等(2008)、庄家婧(2008)和付晓燕(2013)。社交网络(SNS)不仅可以巩固用户在现实生活中原有的社会关系,也能建立新的社会关系和提供具有现实回报性的社会资本。4. 基于媒介情景理论框架,探讨社交网络对于用户后台和个人隐私的影响。许晨(2010)、马芝丹(2012)、朱雪(2013)从网络新媒体创造了网络新情境出发,研究“晒”文化流行的影响。公共空间和个人空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个人隐私也面临着更大的泄露危险。

尽管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已经注意从传播学的角度思考社交网络与青年群体文化之间的关系,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进展,就现有研究的总体来看,尚存在现状描述、对策讨论偏多,理论导向的实证研究偏少的不足,研究深度和研究空间有待进一步拓展。具体而言,在研究视角方面,单纯描述青年群体对社交网站的使用与影响偏多,而相对缺乏社交网络在青年群体文化构成中的结构性深层作用的研究。在研究对象的选择方面,对青年群体的研究比较偏向于大学生群体研究,而忽略了青年群体中的城市白领与部分蓝领阶层。对青年群体概而研究之的多,针对群

体的差异性研究偏少，忽视了青年群体内部的不断分化与社会分层。在方法论层面上，现有研究往往过多地关注社交网络对青年群体影响的表层结果，而忽视了对于使用与适应社交网络过程的意义建构、空间体验与生活实践的理解。在资料收集方法的运用方面，目前使用较多的是问卷调查与文本分析，使得多数研究过于简单化和迷信定量化。实际上青年群体的社交网络使用并非一个有清晰边界的过程，而是生活世界里以事件经历为主线形成的绵延不断的行动流。作为一种生活实践而言，其生活经历和经验本身或许才是说明社会事实的最有力资料。

三、日常生活经验脉络：一种文化研究的新视角

如何全景式聚焦考察青年群体文化与社交网络使用行为之间复杂的建构与解构的多重关系？从社会实践上，社交媒体正在影响并瓦解着当下社会的媒体生产与发布流通的方式，成为一种结构性的社会转型。青年群体在日常生活中所展现出来的诸多社交网络使用行为，在与社交网络的动态关联中，充分呈现了青年群体的日常社会—文化实践。在学术价值层面，对这一新型媒介的研究有助于丰富及修正“新媒体研究”和“青年文化研究”相关议题。通过面向日常社会—文化实践的研究转向，将在一定程度上丰富青年文化研究的传播学视野。在此种背景下，考察并研究数字空间的青年群体日常世界与生活方式，具备较强的当下性和研究价值，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知在当下数字时代，青年群体的生活形态呈现出怎样的多元态势，在社交网络这一媒介社群中受到怎样的影响，呈现出怎样的特质，对青年群体的身份认同和文化消费又有何等激励和促进作用。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具备时代性特征的数字青年群体，与其他时代相比，他们的日常生活和经验感知发生了哪些变化值得我们认真观察、记录与研讨？

作为“数字原住民”(Digital Natives)的青年群体和“数字移民”(Digital Immigrants)的差异性超出我们的想象。数字原住民是伴随着

数字化技术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学习者,数字化生存是他们从小就开始的、也是最习惯的生存方式。他们不仅对新技术的应用得心应手,而且其学习方式、认知特点也可能和上一代人迥然不同。与“数字移民”相比较,他们对于社交媒介的适应度和依存度更大。社交网络对其日常生活实践的形塑有可能在全方位多层面改变了一代人的社会交往方式和意义建构。社交网络在快速的发展中,正以全新的方式介入到青年群体的日常生活实践,带来生活方式的全面更新。社交网络平台不仅仅是虚拟社群,也与购物、出行、旅游、时尚、恋爱、社交、学业、工作等息息相关,甚至有取代现实情境或与现实情境高度融合的趋势。社交网络用户对媒介平台存在高度黏性。多个虚拟平台存在高度的重叠性。媒介平台之间也存在着频繁流动与迁徙。这促进研究者在媒介情境视角下进一步考量虚拟迁移行为的推拉因素,考察网络混杂社群与隔离社群的生态。

对于社交网络对青年群体生活方式与文化认同的影响,我们不应该只关注结果或某个时空节点上的静止状态,而应该将其看作一种动态的过程,一种由政府、媒体、技术、社会网络、个人等多方博弈与共同理解的过程,一种由社交网络与青年社群众多影响因素的互动与建构的过程,一种能够不断体现社交网络空间的各方主体具有能动性、实践性和意义建构性的过程。数字转型是21世纪最深刻、最基本的变化。社交网络是数字社会的重要表征,中国语境中的青年群体文化现象流变只是全球化图景中的一环。本研究期望凸显这样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与全球其他区域的联系与区别,并进一步讨论建构有中国文化自觉的社交网络时代青年文化的策略。

媒介文化研究的传统方法主要是文本、话语分析和民族志。但近期内也有新的研究方法进入,如混合研究法、生命史研究法等等。在研究方法上,研究者推崇以问题意识主导的跨学科研究。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青年群体的社交网络使用现象进行深入的整体性探究,并通过与研究对象的互动,对其日常生活实践和意义建构获得

解释性理解。具体研究参照“过程—事件”分析方法，将社交网络对青年文化的影响看作一种动态的过程，通过“都市田野调查”的方式，选取大中城市的青年群体，由研究者以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进入青年群体社交网络的使用情境中，通过参与式观察、深入访谈、焦点小组访谈等方法，介入青年群体社交空间的流动变迁与意义建构的日常生活实践过程，体验青年群体真实的“数字生活”，观察社交网络如何改变和建构青年群体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实践形态，深入了解处于实践状态中的关系发展演变的整体状况。研究者倾向于阐释主义—建构主义方法，阐释主义—建构主义方法关注意义，力图理解不同的社会个体对某种境况形势的定义(Schwandt, 2000)。它探寻的是人类在意义和感知能力上的差异如何产生与反映出各种具体的、客观无偏的现实上的差异。阐释主义研究者注重去理解社会成员的意义，通常会选择意义导向而非测量导向的办法，例如扎根理论。(何式凝，曾家达，2012)

如何真正做到跨学科的视野和研究问题导向，打破研究学派和研究者本身研究视野的囿限？可能的路径也许是，不以追随某种研究学派的理论或研究范式为出发点，而是以研究问题为导向，根据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决定研究的路径与进入方法。尤其在研究青年文化的方向上，不把研究单纯地割裂成“生产”、“文本”、“受众”三大块，而是将其视为一种“文化流程”(circuit of culture, Harrington & Bielby, 2001)，致力于文化生产和消费的循环影响的过程。诚然，在当下的文化研究中，应该说西方的理论资源和话语占据了绝对主流的位置。但文化研究学派对于“本土性”的强调，也在某种程度上提醒研究者将中国现实作为西方理论注脚的弊病依然是难以绕过的窠臼(李金铨，2004)。某种程度上文化研究的本土性是对全球化理论的修正，这也是“全球本土化”(globalization)的一种话语。只是，真的要以丰富扎实的本土研究与全球话语形成对话，还任重道远。

本书希望突破一般的学术研究作品写作方式过于概念化、学院化的

倾向,希望从关注的问题出发,对数字青年群体整体的日常生活方式进行描述、记录,也期待在文化研究的新视角下理解和阐释数字青年群体的文化、消费、社交、日常生活等若干层面。全书从绪论开始,从整体上梳理数字社会青年文化研究的若干经典脉络及最新路径,期待在一个历史视角下搭建本书的整体性的研究方向与思路。在其后的篇章中,研究者们描绘了了新媒介环境下数字青年群体生活形态的多元化图景,包括社会交往、文化消费、娱乐消遣、社群活动、信息接触与使用、身份与情感等等,涉及了当下数字青年文化日常生活的若干层面:动漫二次元世界、耽美小说、字幕组的数字生活、小时代与郭敬明现象,“中国好声音”的魔力,弹幕网站的真人秀,以及新媒体时代的社交及消费。这些个案既是个体与社群鲜活的经验记录,也拼接出当下数字时代的青年群体总体性的日常生活文化图景。一方面着眼于媒介技术,为探讨数字技术如何改变社会文化提供了一种研讨视角;另一方面也关注当代青年群体,探求新媒介环境、媒介社群以及青年文化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知青年群体在数字时代的社会—文化实践活动。

数字空间是独特的文化空间,网络作为一种媒介技术决定了其使用者,尤其是青少年的行为和文化。同时,青年人并非同质的群体,其媒介资源、媒介技术以及意义建构过程都不尽相同。数字青年文化意义的建构,还是应该转向日常生活的经验脉络去观察。正是在这一思路的指引下,本研究关注数字空间与青年群体文化之间的关系,探讨新的技术样态与青年群体日常生活的相互渗透与相互建构,进而揭示这个时代正在占据更多话语权的数字青年群体的鲜活面貌与文化逻辑。

(本章撰写 朱丽丽)

目 录

绪论：数字青年的日常生活与文化实践 1

动漫迷的二次元世界 1

 宅文化与动漫迷的宅化生活 4

 ACG 语言文化与动漫迷的高语境传播活动 9

 二次元文化与动漫迷的情感感受力 13

 动漫迷的文化认同实践 21

 结语 26

女孩们为何爱耽美？——网络 BL 小说迷群体研究 28

 不约而同：世界范围内的耽美风潮兴起 30

 “志同道合”？耽美迷群体与女性主义 36

 “貌合神离”：耽美迷群体与同性恋政治 48

 想象的政治：被夸大的女性主义实践 55

 结语 63

字幕组的数字生活——以凤凰天使韩剧社为例	66
字幕组的迷群架构和多级传播	68
网络赋权与字幕组粉丝	75
情感游戏与粉丝的“文本再生产”	82
身份认同与“角色扮演”	93
“多重边界”的自我区隔	102
结语	106
小时代与“郭敬明现象”	109
作为一种青春符号的郭敬明	110
消费主义的迷情与铺陈	118
“郭敬明现象”的粉丝推动力	127
“英雄神话”——郭敬明符号的形成与审视	140
结语	147
“中国好声音”的魔力	148
媒介主体的荧屏呈现	149
国家话语:主流意识形态的缝合	157
商业话语:传媒资本主义的新高度	166
处于边缘的受众话语——收编与抵抗	173
“中国好声音”的多重话语	180
结语	190
弹幕网站的真人秀	192
窥视与展演的愉悦	193
认同与反抗的愉悦	199

社交的愉悦	216
愉悦的消逝与反思	224
结语	230
新媒体时代的社交与消费	232
数字原住民的媒介语境	233
青年社交媒体社群	239
社交媒体中的日常消费行为	248
社交媒体中的青年消费文化	253
同侪群体与网络社群的影响	262
强连接与弱连接的影响力	274
结语	281
参考文献	284
后记	297

动漫迷的二次元世界

导读：

本章主要从动漫迷的生活方式、传播活动、情感感受力以及文化认同实践等方面探讨了日本动漫对中国动漫迷所产生的文化影响。在动漫文化的作用下，动漫迷直接参与中国动漫迷文化的生产与传播，形成了包括宅文化、ACG 语言文化与二次元文化在内的独特的动漫迷文化。在日本代表 ACG 狂热爱好者的“御宅”一词在进入中国后发生语义转换，负面与贬义色彩削弱，形成独特的中国宅文化。宅文化也成为中国动漫迷的一种重要的生活状态以及动漫迷身份认同的重要标志。正是由于动漫几乎完全依托于网络的传播活动，网络成为动漫迷文化产生与发展的重要平台，网络媒介成为动漫迷进行社会互动与文化娱乐的公共空间。

ACG 语言是动漫迷在长期观看动漫、进行迷群活动过程中形成的、区别于传统语言符号的独特语言系统。ACG 语言文化的内容主要包括对日本动漫语言与文字的直接复制与移植，以及动漫迷结合中国社会文化语境进行的动漫相关语言的再创造。ACG 语言成为中国网络语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网络亚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动漫是